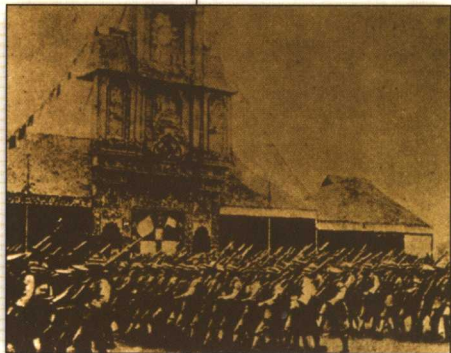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

——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 1900—1937

SHIJI HANXUE LUNCONG

世界汉学论丛



[美] 张信著 岳谦厚 张玮译



世界汉学论丛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

——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

[美]张 信 著

岳谦厚 张 玮 译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
1900~1937/(美)张信著；岳谦厚，张玮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4292-9

I.二… II.①张…②岳…③张… III.社会-演变-研究-
中国-1900~1937 IV.D69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8647 号

-
- 书 名**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
——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
- 丛 书 名** 世界汉学论丛
- 著 者** (美)张 信
- 译 者** 岳谦厚 张 玮
- 责任编辑** 李建军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1/8 字数 261 千字
- 印 数** 1-30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92-9/K·1821
- 定 价** 26.00 元
-

中译本序言

过去常见到“心的旅程”之类的词句，总以为是一种夸张手法，多有哗众取宠之嫌。现在当我回顾这些年来所走过的路途，才感悟到这几个字寓意很深。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我所走过的与其说是一条学术道路倒不如说是“心的旅程”。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认识过程。

我属于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辈人。尽管由于年幼而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冲击，但却在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变化中感受到了这场令人惊心动魄的社会动荡。文革后，我作为首批通过高考入学的一名大学生而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这里当时聚集了一批极其优秀的学子。在此，我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同学们的谈吐中对社会产生了初步的了解。然而，真正使我成熟起来的却是在美国留学。

甫到美国，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抉择。出于安身立命的诉求，几乎大多数前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均选择文科以外的专业。现实亦告诉我：在美国，能够在历史专业中走出一条道路来的几乎是凤毛麟角。面对这一抉择，我首次认真思考了自己的人生目的，而得出的结论是：仅就我本人言之，生存固然重要，可是单单为了生存而生存却毫无意义。所以，我决定走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希望能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和自己了解人类社会的愿望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我当时的想法在别人看起来似乎很具浪漫主

义色彩,但我还是坚定地跨出了这一步。就这样,我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其实,我在国内时就早已听说过芝加哥大学,并知道那是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学府。所以,当我决定舍弃进入诸如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这类在中国研究方面顶尖的大学之机会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芝加哥大学的美好憧憬。然而,这种情感马上就被现实破毁了。首先,由于国内所受的历史方面的教育不同,我几乎对美国的那一套无所适从。再者,出于个性,我的导师对所有的学生都过于苛求。眼看着不少同学转学或退学,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恼和焦虑。就在这种几近于绝望的境遇中,我再次仔细地斟酌了自己人生的目的,结果是我决定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下定决心从头学起,从最基本的文科知识学起。我决定不单单补上历史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补上所有文科方面包括政治、经济、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其目的乃是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者。我就这样地舍弃了大部分的周末,谢绝了朋友的邀请,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芝加哥大学的六年里,我真正体会到了寒窗苦读的滋味。通过这一切努力,我的导师终于对我刮目相看。我感谢芝加哥大学给予我最高额的奖学金,使我能够专心攻读。我亦非常庆幸这几年拥有妻子的陪伴,她给了我无上的安慰。

由于多年的苦读,我开始对美国的各种文科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乃是有关国家、社会和个人行为的理论。正好当时历史学界处于社会史研究的热潮中,我于是决定运用我所学的所有知识来撰写一篇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文。我选择了河南作为研究地点,因为当时还无人对之进行研究。我选择了对国家、社会和人的行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主要的三

个命题——进行探讨,主要是为了使我自己能够对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因此,我边学习边写作。正巧,当我刚开始构思论文之际,我的女儿降生了。女儿的出生显然给我带来了更多的责任。在与妻子分担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我尝到了做父亲的乐趣和艰辛。但就在这些早起晚睡的日子里,我的写作却异常地顺利。因为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早日完成论文。

本以为论文一经写作完毕,即可予以出版。然而,当我将论文寄出去征求意见时,才发现自己的研究和理论尚未达到第一流水准。尽管当时已有几家出版社对我的论文发生了兴趣,但我心中明白自己的文章不可能在西方最权威的出版社出版。我又一次陷入了苦恼。而在此时我的背亦由于长时间坐着写作,开始疼痛起来。我无法坐着写作,只能半躺半睡地写。如此多的艰辛与磨难,促使我又下决心,再从头开始。于是,我开始重新查找资料并阅读西方理论著作,其结果是完全放弃了原来的论文,而重新在同样的题目上写出了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否有此能力。我经常彻夜不眠,反复审视自己的主题思想。有时,为了寻找和推敲用以表达自己思想的确切词汇,往往要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虽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英语,但到阐述理论时则往往感到不那么得心应手。这样,我又得同时在英语上再下工夫,直到能够确切表达自己的意思为止。在这五年艰苦的研究和写作中,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创业的艰难。不过,就是在这段时期,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行为的认识逐渐成熟了起来。

当然,这段日子所留给我的不仅仅是寒窗的回忆。我当时曾得到了学术界不少学者的帮助和支持。由于积极参加学术会议,

学术成果逐渐得到了重视。加州大学的魏斐德教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尽管我当时由于无知而失去了从师魏斐德教授的宝贵机遇,但我却有机会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受到他恩师般的关怀和帮助。同时,学术界的其他人,像萧邦齐、周锡瑞、玛丽·兰钦、裴宜理、杜赞奇、戴福士、吴应銑、黄宗智、叶文心、波迈拉兹、马若孟等,他们有的在阅读了我的论文后提出了珍贵的意见。特别是萧邦齐,他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并积极支持我组织的学术会议。在这段艰苦的写作时期,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成了我最主要的精神支柱。

我的这本书几年前已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今又由岳谦厚教授和张玮博士翻译成中文而即将出版。我很感谢这两位学者能在百忙之中从事翻译工作。由于此书涉及到很多西方理论,有不少词汇是很难在中英文之间找到对等的意思。岳教授和张博士在翻译中下了很大的工夫,同时在流畅的译文中也显示出了他们很高的翻译水平。我亦很庆幸能有像中华书局这样享有学术上最高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此译本。同时我也希望我的书能给我的中国同行带来一些新意。

张 信

2004年2月25日

于美国印地安那大学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张 信 1

第一部分 导 言

第一章 理论背景····· 1

一、以社会演变为理论框架····· 8

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11

第二章 河南之社会经济环境····· 23

一、河南的地理与市场结构····· 23

二、迥然不同的河南西南部与北部区域····· 26

三、外国入侵、商品化与匪患危机····· 34

第二部分 地方精英与共同体权力变迁

第三章 演变中的地方社会····· 43

一、晚清公众组织之发展····· 44

二、世纪之交的变化····· 47

三、1911年革命期间的夺权活动····· 50

四、精英活动之衰落：早期民国····· 53

五、20世纪20年代中期地方政治之演变····· 54

六、抗衡国民政府····· 63

七、总结····· 64

第四章 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精英流动	72
一、晚清地方社会	72
二、1911 年革命	75
三、地方权力结构之变化	76
四、总结	91

第三部分 精英活动与社会转型

第五章 以个人关系网为主体的社会	99
一、文学社的最初几年	101
二、地方关系网与地方权力	104
三、赢得地区地位	106
四、更上一层楼	108
五、渡过难关	110
六、跨地区活动	112
七、拜访袁世凯	114
八、袁世凯的崛起	117
九、“共和不独立”运动	119
十、连接关系网	121
十一、联络人的权力	123
十二、创建国家级关系网	126
十三、暂时的挫折	127
十四、帝制之争	130
十五、关系网的衰落	132
十六、总结	133
第六章 地方认同、地方主义与合法性危机	144

一、自治之创办	145
二、自治方案	150
三、合法性危机	161
四、地方认同问题	166
五、地方主义现象	171
六、从精英统治到民众参与	173
七、南召自治	176
八、总结	178

第四部分 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和社会间的互动关系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 189

一、国家的定义	190
二、河南北部	192
三、河南西南部	214
四、总结	223

第八章 相互制约中的国家与社会..... 235

一、社会控制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	235
二、河南北部	239
三、河南西南部	258
四、总结	280

结 论..... 295

一、个人层面上的演变	295
二、社会层面上的演变	297
三、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演变	298

4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

四、社会演变与中国现代转型	300
附录	305
引用书刊目录	314
译者后记	372

第一部分 导言

第一章 理论背景

1938年7月炎热的一天,就在日本军队刚刚占领了首都南京之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在武汉陷入敌军之手的两个月前抵达了这座城市。蒋在繁忙的日程中,与别廷芳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别是来自河南西南部(亦称宛西——译者注)的一个地方“无赖”或“恶霸”^①,他在本地区之外没有什么政治关系,在国民政府中也没有任何职务。别对蒋的邀请甚为吃惊,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待遇,且在国家危难之时当然就更不可能了。基于此种考虑,他担心这是那些想逮捕他的河南官员设下的一个圈套。但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别警惕地去了武汉,并受到了蒋的热情款待。会晤中,蒋盛赞了客人。他称赞别在家乡抵制土匪强盗的功绩,及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引导乡民们改善民生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会见结束前,蒋授予别一枚勋章,并宣布他的老家(内乡县)为中国三大模范县之一,且正式认可他领导南阳地区(河南西南部)一支近二十万人的地方武装^②。

为什么像蒋介石这样的国家元首,在日本人逼近这个城市之时,还会垂青于一个像别廷芳这样的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小地方性人物呢?其答案则出于河南地方在20世纪初期所发生的有

2 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

机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在国民政府控制该省之前,这些变化促使国家妥协于地方精英。这些变化是整个国家深刻的社会演变的一部分,其源于社会中的个人在其特定时期的需要、动机以及为了应对新世纪之挑战所做的努力。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仅仅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冰山一角,而这些社会变化则使中国以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了现代化^③。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是由其社会内部自身衍化出来,笔者认为它是一次真正的自我演变。

以往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主要使用三种方法来考察国家和社会领域里的变化,而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在解释方面的优势和局限。第一种方法注重地方精英:他们的个人背景、社会地位上升以及在基层共同体中的角色。这一方法基于以前对中国社会“绅士”(“gentry”)阶层的认识。受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影响,沃尔弗勒姆·艾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首次使用“绅士”(“gentry”)这一概念来考察宋朝以前的农村精英^④。后来,萧公权、费孝通、张仲礼、瞿同祖和弗朗茨·米哈伊(Franz Michael)都运用同一概念来描述帝国晚期的地方领袖^⑤。苏珊·曼·琼斯(Susan Mann Jones)和孔飞力(Philip Kuhn)曾质疑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但他们的研究仍然发现它能很有效地说明这些人物在帮助国家征收地方赋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⑥。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民国时期地方精英不同程度地充当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经纪人^⑦。所以,运用这一种方法非常有助于理解帝国时期精英阶层内部的变化。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衡量地方共同体中地位、权力和声望的旧体系逐渐瓦解了,其结果使精英层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于是,不作修正地运用这种方法来考察20世纪的中国社会就变得

很困难。于是乎,许多历史学家便将原来的术语“社会流动”改为“精英流动”^⑧。

第二种方法是着力考察社会发动过程中的政治运作,特别强调精英活动的扩大。肖邦齐(Keith Schoppa)发现,在20世纪早期浙江的商业化地区,不断增长的“政治升化”是地方精英活动最重要的发展特点^⑨。玛丽·兰钦(Mary Rankin)、威廉·罗(William Rowe)和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进一步指出,在十九世纪的国家商品化地区和大城市中,精英活动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政治水准,在20世纪早期则更进一步。精英们发挥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增强了他们在官僚政治体系之外的活动,特殊的利益集团则充斥了城市^⑩。以上这一方法在分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哪些特定发展时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当然,精英活动的高度组织化,是社会发动的总趋势中的不可缺少部分。但是,基于此法的研究显示,高度组织化的精英活动,一般只局限于商业或城市地区。因此,它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城市与农村、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精英活动之间存在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⑪。

第三种方法着眼于探索国家政权建设的效果。孔飞力发现国家权力曾转移到了地方精英之手——一种始于十八世纪中国之“地方军事化”过程的趋势^⑫。这种趋势在20世纪早期的自治运动中就已存在,在民国时期则因国家积极伸展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而减弱^⑬。杜赞奇证实在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上,袁世凯、各类军阀和国民政府都一致。杜赞奇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描述他们的努力是如何受到地方精英抑制的^⑭。从国家政权建设在财政领域里的不足的角度着眼,苏珊·曼·琼斯则把这种趋势追溯到了1853年清政府采用“厘金”的那一刻。琼斯进一步

注意到在晚清与民国之间,国家与地方人士(即地方精英)作了许多妥协^⑮。最近,这种以周而复始的绅士社会对抗国家权力的观点为基础而建构的国家政权建设模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波迈拉兹(Pomeranz)清楚地认识到沿海地区与北方腹地存在着国家政权同时受到破坏与建设这一双向过程。他提出超越“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简单循环性模式,而更多注意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发展^⑯。

为了结合微观与宏观之视野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本研究专注于河南西南部(宛西)和北部(豫北)这两个地区,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1900年到1937年之间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变化。笔者之所以选择河南作为研究的重心,乃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有关河南的国家与社会的问题还缺乏研究。先前对该省的研究要么集中于共产主义运动^⑰、土匪和秘密会社^⑱、军阀主义^⑲,要么集中于晚清政府官员与乡村领导^⑳。本书提出应首先郑重地考察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基层社会的转型。第二,河南地处中国中北部,这就使与相近主题的其它研究进行比较会富有成效。关于同类的研究,以前多集中于中国南部或东南部,很少着力于中北部。本研究将与这些研究进行比较。

河南的西南部和北部成为考察的目标,是因为它们在社会、经济和地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对有关这两个地区的实际状况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出在同一个省区内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这项研究集中于1900年到1937年间,乃是由于河南的地方权力结构变化始于世纪之初,随着日军的入侵而出现断层。因为中日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河南社会变迁的整体模式^㉑。

笔者将采取扬长避短的方法来综合性地对待以上三种研究角度,以构建一个有关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整体性研究架构。本项研究不像前述三种研究方法那样孤立地去考察精英流动、社会动员和国家政权建设,而是将三方面看作是源于基层的中国社会演变——这一独立的和自发的过程——内部的三个有机体。笔者首先观察个人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地方精英们的变化。(这里得说明一下,本文对地方精英采用的是宽泛的定义,它指的是那些无论采取何种途径在争夺地方政权中的得胜者——这一定义不仅包括那些有权势的共同体领导人、民团首领和大地主,亦包括那些下层精英分子,诸如税收经纪人、巫医和书生^②。采用这样一个宽泛的定义的优点,乃在于它更切合 20 世纪初期中国地方社会实际:因为精英阶层已极大地扩展到包括具有相当广泛背景和能力的人。)然后,仔细考察植根于这些基层共同体变化之中的社会与政治发展。最后,探讨这些社会的发展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影响。通过运用这种相当广泛的视角,读者不仅可以观察到个体、社会和国家/社会关系方面所有的有机联系,而且亦可以理解每一变化在更大范围内中国社会自我转型中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首先从个人如何应对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挑战入手,而这些挑战源于社会内生的与外生的因素。它考察不同的社会成员是如何为了利用这些社会变化所产生的机会来保持、获得或增强个人地位,并且考察中国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及其个人野心、欲望和当时所产生的应对行动而改变了^③。所以,它描绘的是一幅关于 20 世纪早期地方精英的多维画面。而且,为了分析地方精英阶层变化的来龙去脉,本研究之重心在于乡村共同体,特别是其权力结构之演变。从这个角度出发来